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 编

韩加明

顾 问

迈克尔·麦基恩

现代性的寓言 英国 18 世纪文学与文化

[美] 劳拉·布朗 著

牟玉涵 译

Fables of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nglish Eighteenth Century

Laura Brown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 编

韩加明

顾 问

迈克尔·麦基恩

现代性的寓言

英国 18 世纪文学与文化

[美] 劳拉·布朗 著

牟玉涵 译

Fables of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nglish Eighteenth Century

Laura Brow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寓言:英国18世纪文学与文化/(美)劳拉·布朗(Laura Brown)著;
牟玉涵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942-1

I. ①现… II. ①劳…②牟…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研究—18世纪
IV. ①156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153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Janus 译丛

现代性的寓言:英国18世纪文学与文化

著 者 (美)劳拉·布朗(Laura Brown)

译 者 牟玉涵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蒋 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942-1/I·2018

定 价 8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主编的话

韩加明

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次翅膀,不久,远方山呼海啸。这已为世人皆知的蝴蝶效应道出了世界万物的密切联系,虽有时诸事看似相隔万里,泾渭分明,但探赜索隐,却是丝丝入扣。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的存在也依据自然的规律不仅在个人与他人,及至群体之间建立交错互动的关系,而且置身于一个由往昔、当下与未来织起的网中。生活在当下的世人往往着想于未来,效力于当前,有时不免忽略如此事实:未来之新是以往昔之旧为基,借助当下的中介促成。因此,了解这个世界的历史与过去,方能知晓时下的来龙去脉,也就能洞悉未来的风云变幻。基于此,我们推出以“雅努斯(Janus)”为命名的译丛。

雅努斯(Janus)是古罗马元初与转折之神,亦称双面神。他有两张脸,一面追思往昔,另一面放眼未来。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即源自于此。双面神同时也主宰冲突的萌发与终结,主司战争与和平。在他的神殿中,门若开启就意味着战争,门若闭合则意味着和平。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们又赋予此神新的寓意,希望此套译丛以史为鉴,探究西方文明发轫之渊,而目之所及,关怀所至正是当下中国,乃至中华文明的未来。

当下中国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

的发展道路。然而,今日之伟工源自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源自封闭多年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这一事实。中国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复兴中华文明,一如当年汉唐之于世界文明,这一使命感激荡在无数国人心中,也促使众多国内学者著书立传,为当下及未来的国运力陈个人洞见。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贡献中,系统译析剖析西方现代文明起源动因的学术名著是我们掌握当前世界智识成果的捷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鲁迅先生所言的,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煮自己之肉的盗火者心血之作。

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轫源于 18 世纪的欧洲,英国则是火车头。这个孤悬亚欧大陆之外的岛国开现代文明之先。君主立宪制的逐渐成型为困扰人类历史的专制王权与国家治理权对立冲突提供了切实可行,效果颇佳的解决方案,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工业革命及重商主义不仅引领整个人类进入全新时代,而且以贸易、商业为主导的国家政策短期内让小小岛国有雄心与实力成为日不落帝国,此间订立的种种工商业行为操守成为现代经济文明指南;国民的富裕与时代的发展催生了文化需求,阅读时政期刊掌握咨询,学习得体举止;阅读小说感受审美愉悦,领悟诸多作家苦心孤诣力求塑就的时代意识,现代文化起源可以追溯至此。由此可见,18 世纪英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有机互动,彼此构建的样本,而此时的中国正是国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永延帝祚随后证明只是皇室呓语,探究两国国运的此消彼长内在原因能让我们明白现代文明发展的肌理,为当下与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

自 18 世纪以降,世界文明几经跌宕,有太多值得关注之处。然而,纵览古今,放眼中外,不难看到文明的活力在于开放,在于兼容并包,由此才会有创新与发展。作为拥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一度习惯于“中央之国”这种封闭的状态,对外国文化与文明吸纳、借鉴方面存在不足,且总有循环复合的趋势。时至今日,新时代不仅要求我们融于世界,而且要求我们保持民族的个性,在此两者之间保持恰

当的平衡实属不易。此番努力中最难之处是破除一个个有形与无形思想禁锢,超越当前诱惑与困顿,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思想启蒙。这是我们学人应尽的本份,也是我们应肩负起的开启民智之担当。

有鉴于此,本系列译丛从大量外国研究 18 世纪学术专著中遴选优秀佳作,以期在为国内学者提供学术参考的同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高质量,促使人思辨的读物。这些学术专著虽然涉及面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即从万花筒中选择一个精妙点着手,通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将具有变革意义的文化现象发展脉络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构思缜密,论证有力,而且才情具备,读来口有余香,是国内学者学术论述的极佳学习范本。

古人云,开卷有益,我们在此恭请读者通过相关研读获得所需学识,同时寄语此译丛能成为一座跨越时空,跨越族群与文化的思想之桥,让每一位在此憩息、行进的游人得以远眺与俯瞰世间的万般风景,也愿此桥如一道彩虹映落于历史长河,虽波光潋滟,但永存恒在。

谨此为序。

导言：文化寓言、现代性经验和差异范例

本书研究的客体——文化层面上的“新世界寓言”——是 18 世纪文学经典的幽灵。这些幽灵恍若远在天边，又仿佛近在眼前，它们是没有文本的故事，没有作者的虚构事件，却又基于实实在在的现代欧洲经验。它们在 18 世纪英国印刷文化的各种运动、形式、体裁和模式中随处可见，又凌驾其上。本书力图构建“文化寓言”作为批评范畴，进而运用这一范畴来探讨 18 世纪英国现代性的构成。

乍看起来，“文化寓言”这一短语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将“文化”和“寓言”并列，意味着将物质和历史的世界与审美的世界联结，这使得同时阅读文学和历史成为可能。本书中，文化寓言是一种形式构建，这意味着它以一系列相关修辞为特点，这些修辞或具备显著的结构，或处于动态关系之中。反复出现的修辞附着于自身具体的文本，产生于自身的修辞传统。然而，如果将这些修辞从具体文本取出并搁置一处，它们便彼此互动、相互阐释，进而呈现一系列的意义、情感、甚至反讽，这是一个共同的想象图景。

我的研究视角与意识形态批判及修辞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其中修辞分析方法是由形式主义批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深受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影响的后结构主义那里吸收而来；意识形态批判发展于同一时期，来自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为

- 1 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接下来的解读源自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的变迁。这些变迁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到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这一变迁中，某种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宽泛化、复杂化的文化定义，取代了原本占据决定性地位的经济和原本占据首要地位的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样，一个文化寓言超越了特定的作家和文本：它是某个时期、许多文本的集体产物。和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文化寓言具备具体的形式结构，可以被定义，也可以像小说或诗歌一样被细读；文化寓言还具备某种审美特质，这使得它拥有短暂的活力，获得文学传统的相对自治，与其他类似的文化寓言归属联结，甚至获得权威地位。然而，虽然一个文化寓言有清晰的形式，它却不一定与某个单一文本完全契合。一个文化寓言可能只是一个文本的一小部分或某个维度；一个具体的文本可能包含数个文化寓言。对待文本，我关注的是具体的意象、连续的比喻和循环的修辞形式，由这些修辞形式而来的反差、分裂或张力受到格外关注。我选择的文本涵盖多种话语模式——从经典、非经典的文本到期刊文章、医学论文、哲学著作、流行歌谣。我将这些从修辞、互文层面开展的细读与当时史料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当然，在这一方面，我对文化寓言的想法显示了文化主义和历史主义视角的影响。此二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主导了人文学科的批评领域，对我影响最直接的视角来自法国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以及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在使用寓言这个概念时，我尽力强调这一基于想象的现象的集合性，它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它的形式动态。通常我们认为，与单一文本相比，寓言的涉及更广泛；与单一故事相比，寓言的文化意义和影响力更深刻。寓言的叙事轨迹还超越了某个比喻或修辞要么囿于

局部、要么僵死的效果。因此,虽然人们都将寓言和狭隘的说教意蕴联系在一起,对此我并无心提及。我希望人们将寓言看作意义的精华——此处指的是某个历史时刻的意义。我虽不想在此处的寓言概念中包含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纳入其神话概念中的超验审美范畴,但我的确认为寓言包含着巨大的审美力量。

虽然文化寓言是由意象、比喻,甚至有时由具体的意味深远的词语所组成,但在我看来,文化寓言是一套复杂的想象体系,牵涉某种过程,某个展开的问题,某个演变的命运。因此,文化寓言可以说是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当下经验的发散,故事的情节则反映了在想象层面上与当下经验的磋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文化寓言的理解,与结构主义者或新亚里士多德芝加哥学派对形式或想象体的建构的理解有着紧密的关系,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克雷恩(R. S. Crane)的一些重要预设相吻合。不过,我的目的不在于给出一系列包含这些想象事件的范例,而在于将文化寓言作为灵活的模式来运用,从而理解 18 世纪史料方方面面所涉及的各种意象和修辞以及这些意象和修辞之间的联系。文化寓言这一概念意在给出一种分析模式,而不是设立一套分类体系。如此,文化寓言的概念意味着我应给出关于文学文化之本质的观点:即文学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集合精神,由其集合性与当下经验中最关键、最不确定、最突出的方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使得文学文化与历史变迁中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文化寓言不仅提供了一种阅读文学文本的方式,还提供了一种阅读文学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方式。

从根本上说,一个文化寓言和物质文化的某个具体方面相关,历史变迁的经验浓缩在物质现象中,而文化寓言则在想象的层面上塑造、记录并反映这一经验。因此,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以介绍具体的客观世界开篇,因为那是各个文化寓言得以产生的基础,例如:城市卫生环境、航运、股市、印刷、来大都会游览的“土著人”,以及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依据这些客观经验而建构的寓言是对欧洲都市文化的集

体表达,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不属于任一单个团体。它们并不是关于某个阶级、某种性别或某个小圈子的故事,而是关于文化经验的寓言,因而与它们的历史时刻达成明确的契约。通过这一契约,文化寓言得以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么能非常敏锐地把握历史进程,要么能极其清晰地反映这些进程中的冲突矛盾。

如此,文化寓言可以成为去神秘化的工具。然而,正如相对于意识形态作品而言,文化寓言的作品更丰富多样且难以捉摸;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去神秘化功能而言,我们将要看到的文化寓言对历史的把握,实在更难以预料。因为文化寓言产生于客观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其中还有一些当下的来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审美的力量相互作用,使得文化寓言的结论有的具备预言性,有的具备实际意义,有的则表达了某种焦虑或推测。如此,文化寓言可能担负起去神秘化的任务,揭示当下历史时刻潜在的矛盾或发现寓言得以形成背后的神秘社会关系。然而,文化寓言也可能提升意见的某一构建,加强当下的某一偏见,揭露人们信仰中尚存疑虑的成分,或是为一种新型的知识或存在开启想象之路。

最后,希望我的文化寓言概念能够介入时下的文化研究课题。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在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开发丰富的研究分析材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虽然文化研究与雷蒙德·威廉姆斯和迈克尔·福柯这些具有理论自觉性的批评家紧密相关,但人们却一直无法界定驱动这一批评工作的前提或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是文化研究具有普适性的年代,表现在其发散性、多样性,以及实用性。这就使得文化研究的应用效果时好时坏,而文化研究所构建的批判性思维模型也常常毫无成效。至少,在构建对出版文化的批判性思考时,文化寓言可以提供有效的方式;在将文化研究的洞见应用到文学作品的解读时,文化寓言还可能提供系统的方法。前者是整本书的目的,后者则体现在本书第四章,我对一个经典文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群愚史诗》(*The Dunciad*)——从

几个相关文化寓言的关系入手展开解读。

—

在这一研究中,我给出定义的寓言表述的是现代性的一些核心经验。总体来说,这些寓言说明,不管是在想象层面,还是在话语层面,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形成于 18 世纪,并且其形成受制于他者性——通过与女性的修辞、或非欧洲人的修辞经过想象的磋商而成。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文化寓言的解读探讨了现代性的经验,希冀我的探讨方式既能阐释文化寓言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又能阐释历经英国 18 世纪延续至今的现代性本身。

我仅致力于细读现代性的经验,不对现代性概念做进一步探讨。针对现代性,人们在 20 世纪展开了大量复杂并且多学科的讨论,我只取其中聚焦出版文化之集体效应的一方面。我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建立在一种我所接受、也广为接受的对现代性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理解。^① 因此,对于最近出现的那些可能会修正或质疑现代性概念本身的观点,特别是有关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观点,在此我不做探讨。全球性或比较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们致力于解释从欧洲到亚洲的各处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工业化、革命,或资本主义兴起、金钱、市场、商品,或现代金融。虽然通过全球化的平行构建,这些国际化的解释常被视为重新构建了有关现代性的新的

4

① 对现代性的研究视角与我类似的例子,参见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Rita Felski,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red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比较性概念,但是这些却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一个与西欧历史紧密相关的现代性的概念。^① 我的研究完全立足于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参与上述国际化的讨论。

- 5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我也不准备介入从 17 世纪以来针对现代性的地位、道德和认识论蕴涵所展开的哲学辩论,以及有关启蒙、人文主义、科学、话语和相对主义的辩论,^②除非我对出版文化的解读可能为阐释现代性的一些相关议题提供新的视角,这些议题包括人文主义认识论中非人类的地位,或者形而上学和帝国主义自辩书之间的联系。我还必须忽略审美现代性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为我的解读材料产生于审美现代性之前。最后,我还有意回避了后现代主义。我对现代性的再现不直接涉及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由这些 18 世纪材料而得以定义的文化形式是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而此现代经验也见于今日之社会。在这一点上,本书同意以下观点,即后现代并非有着清晰定义和明确界限的

① 例如: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Frank Perlin, *The Invisible City: Monetary, Administrative, and Popular Infrastructure in Asia and Europe, 1500—1900*,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3, 以及 *Unbroken Landscape: Commodity, Category, Sign and Identity: Their Production as Myth and Knowledge from 1500*,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② 近期出现了大量这类辩论的合集,例如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1972;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32—50; Habermas,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3—15, 以及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Barbara Maria Staffor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 the End of Modernity: Towards the Re-Enlightenment”, in *The Past as Prologue: Essays to Celebrate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ASECS*, ed. Carla H. Hay and Syndy M. Conger, New York: AMS Press, 1995, 403—416。

时段,而只是现代的一种剥离。^①在上述的所有方面,我对现代性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我对这些文化材料的阐释——这些文化材料是现代生活经验本质的具体范例——将会在现代性概念更宽泛的发展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阐释的意义不限于本书,也不限于英国历史的这一时段。不过,从这个特定的历史和材料范围来看,本研究还特别要对时下普遍接受的现代性的定义提出一个重要质疑:我们对西欧现代性的理解应该关照性别与种族所带来的影响。现代性概念的这一复杂性是我的中心议题。

在《现代性的寓言》一书中,我所采用的现代性的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传统。我不从规范意义上考虑,将现代性看作是以理性和启蒙为主要关注点的自由化元叙事,相反,我把现代性看作是由社会、经济形式的复合体而产生的后果,而这些社会、经济形式是那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主要特点。因此,我启用了宽泛的现代性的概念,即在大体上采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框架,但又基本忽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概念中还包括文化唯物主义,因其涉及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和私人空间的发展,并关注民族主义的演变现象。以 17 和 18 6 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全面胜利为中心,现代性指的是与上述中心相关的历史转变:经济和生产的本质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结构变化,文化的定位和意义的变化,以及历史本身概念化的变化。在经济领域,现代性涉及了商业化、商品化、市场扩张和利益优先。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代性除了体现在官僚体制的发展、城市化、民族国家的兴起,还体现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大量人口的全球迁移。在哲学思想方面,现代性表现在社会契约概念、私有财产概念,以及民主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现代性因历史分化

① 在这一点上,Frisby 的结论——“谈论后现代……因此有些为时过早”(272)——与我的观点相似。另外,亦可参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扩展定义: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而格外显眼,因为历史分化关注充满新鲜感的当下,以及当下与过去之间的鸿沟,从而催生了诸如发展、进步、变化的概念。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这一显著的“现代性态度”描述为“‘今日’与历史有别之反思”(38)。这些变化的经验当然是极其复杂的。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定义:“现代意味着我们进入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允诺将赋予我们奇遇、权力、欢愉、成长,以及我们和世界都将焕然一新——另一方面,这种环境又威胁要毁灭我们所拥有、所了解的一切,以及我们所是的一切……现代性……将我们卷入了一个不断瓦解重生、充满冲突、含糊和痛苦的大漩涡”(15)。上述现代性经验的特点随着 19 世纪工业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深化和突出,但是,现代性的很多核心元素在工业革命尚未得到巩固的 18 世纪已经初见端倪。

如今 18 世纪被当之无愧地冠以“革命”的时代:商业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资产利益带来的特权;英国获得了第一个海外帝国,奴隶制的推行和普遍盛行的种族主义;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后王朝时代的民族国家,拥有了民族身份的话语和政治实践;金融革命和银行业、信用、证券交易和国债的兴起;农业改革,乡村转变;消费激增,零售市场上升;发展起一个自我延续、自我规诫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文化统一的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壮大;出现了广告、中产阶级的时髦和过时的概念;以及家庭结构方面的根本改变,即在核心家庭中,成员之间以同伴关系相处。当然,上述的一些“革命”,发轫于 16 世纪或更早:圈地历经三百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起历经约两百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 15 世纪,虽然并未形成条理清晰的现代经济体系,但布罗代尔指出,那时的“经济生活形式……已经非常现代”。^① 18 世纪晚期的工业革

①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xiii.

命带来了更加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体现在经济、乡村，以及劳动的本质和条件。不过，历史学家也注意到，1660 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许多重要的变迁在那个时段同时展开。^①

8

- ① 近期对那个时段的很多相关历史研究都提到了这些变迁。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此一一介绍，以下的书目是经筛选后的资料。有关资本主义，参见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有关帝国，参见 John Brewer,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P. J. Marshall, vol. 2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关奴隶制，参见 Robin Blackburn,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Verso, 1997;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ed. Barbara L. So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有关民族身份，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Kathleen Wilson, *The Sense of the People: Politic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 1715—17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关金融革命，参见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有关工业革命，参见 Maxine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 1700—18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at Huds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E. Arnold, 1992。有关公共领域，参见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有关中产阶级，参见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有关消费、广告和时尚，参见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Hoh-Cheung Mui and Lorna Mui, *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关家庭，参见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在对这个文化历史时段的研究中,我没有采纳近来最为常见的分类系统:即 18 世纪是始于 16 世纪的“早期现代”的延伸。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在于,人们不再从中世纪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复兴,而是从 18 世纪的角度来重新考量文艺复兴时代。不过,这种分类方法强调的是 18 世纪与 16、17 世纪之间的相似与传承,而我的研究恰恰关注的是这之间的差异和革新。此外,“早期现代”这个说法将自身与“现代”划线二分,从而间接地将 18 世纪与“现代”割裂;而 18 世纪与现代性建构之间的深刻联系,正是本书要推进的议题。

18 世纪出现的那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那么显而易见、令人恐惧,有时又出人意料、史无前例,吸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想象,从而塑造了一种出版文化,这种出版文化以独特的新奇感和临场感直接记录了集体想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这种“现代感觉”描述为“我们确信自身是崭新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与从前不复相同”(310)。这种新奇感不断含蓄地出现在对 18 世纪的批评解读中,近年来日趋明显。普鲁姆(J. H. Plumb)在题为《接纳现代性》的文章中指出,在这个阶段,“很多出身低微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对哲学理论一窍不通,却开始对自然以及自然的运作着了迷;……他们的业余爱好或是他们的宠物……使得他们去接纳世界的现代性,虽然这种接纳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还使得他们去享受变化和新奇,并对未来更加满怀期待。”^①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和莱纳德·田纳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认为这一时段及弥尔顿在这一时段的地位,正是思想上、艺术上发生不可逆转、“惊人而又深刻”的变化的时代,反映了“私人生活的起源和现代性发轫的关系”。^②在最近一篇对蒲柏研究进行总结反思的文章中,霍

① Plumb, “The Acceptance of Modernity”, in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316—317.

② 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 *The Imaginary Puritan: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Personal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7, 23.